

蒋介石家世史料研讨会 论文集

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浙江图书馆

奉化市政协

奉化市图书馆

合编

浙江 杭州

1994.8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蒋介石家世史料研讨会 在溪口举行 (代前言)

由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奉化市政协和奉化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蒋介石家世史料研讨会”于1994年8月7日至8月11日在蒋氏家乡奉化市溪口镇举行。来自省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会聚一堂，就蒋介石家世史料的整理研究、蒋介石和其他民国人物的研究、家族谱牒史料的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吴仁源、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荣书局董事长石景宜先生也应邀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会议听取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关于征集、整理、出版蒋介石家世史料工作的情况介绍。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征集出版民国人物史料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出版了诸如《蒋介石家世》、《陈英士》、《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陈诚传》等专辑史料，此外还有许多史料散见于各辑的《浙江文史

资料选辑》中。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得到国内史学界的认可，还受到台港及海外华人的重视和欢迎。与会代表认为，从研究蒋介石身世着手，进而深入研究蒋介石这一历史人物，研究中华民国和民国人物的历史，其意义远远超过我们对蒋介石家世史料研讨的本身。

由政协文史系统与图书馆系统共同组织发起的专题性学术研讨会，在我省尚属首次。为了配合这次学术会议，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奉化市图书馆和档案馆合作编印了各自所藏的《蒋介石家世及有关史料联合目录》。

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提交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现将部分论文编印出版，为专家、学者提供参考资料。

浙江省政协文史办

1994 · 8

蒋介石家世史料研讨会论文 目 录

论蒋介石研究

杨树标

重视对民国人物及家族史料的征集与研究

叶炳南

关于《蒋介石家世》第二版的几个问题

朱向农

《蒋介石家世》出版的前前后后

王遂今

溪口蒋氏遗迹和蒋介石身世

王舜祁

关于蒋介石史料出版物的点滴见解

林祖藻

论蒋介石研究

杨树标

一、蒋介石研究的回顾

较长时间来，在史学界流行着一种“左”的看法，即反面人物；是不能功过并论的，其过是可以大书特书，甚至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可以引申开来、可以上纲上线，否则就是为敌人（包括党的历史上犯倾向性错误的头头）树碑立传，是阶级立场问题。记得史学界有过几次大的发难：李秀成的讨论、陈独秀的讨论、瞿秋白的讨论，这几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业绩，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将这些人物的一生加以评述，讲清楚这些人何时有功、何时有过，再分析其原因，提出可借鉴之处。论理这种评述是十分科学的，评论者的动机是很善良的，应该说效果也是积极的。结果，用一席“晚节不

忠不足为训”(有人传这席话是毛主席说过的)，把这些历史人物完全否定了，把史学界的这种科学研究斥之为“为叛徒辩护”。更何况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了，因为在历史上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即使要写他，必须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人民公敌”或“国贼”或“独夫民贼”。无疑的，对他是一斥到底。既然这么坏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也一定是坏的(这是一种害人很深很久的“阶级分析法”)，家教一定坏，他本人从小也一定很坏。一种传统的说法：“他本来的家庭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出的一种人民吸血鬼——盐商的家庭。阴险狠毒，和官厅合伙打劫，这就是中国盐商堆积金银财宝的著名的本领。蒋介石所谓从小起所受的‘家庭教养’正是这种用阴险狠毒的手段勾结官厅、打劫人民的本领。蒋介石经过这种教养，便从小时候起，一方面造就了他寄生虫的‘德性’，……一方面又造就了他的流氓‘德性’……。”现在再来读引这段话，就会感到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最起码是太牵强附会了。更甚者，还在蒋介石是“搥油瓶”上大做文章，这恐怕也是中国搞臭一个人的特殊手段。长期以来只有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

这一本“经典”之作。记得在1961年，当时中央（后来才知道是陈毅同志）下达一项任务，要写一本蒋介石传，其目的是写给苏加诺、尼赫鲁等人看的，蒋介石是他们的一面镜子。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之教授承接这一任务，我们几个人（当时是五个人，现在有二人已去世。）有幸给他做助手，并开始了这项工作。我第一次读了从台湾进来的《蒋总统集》（红绸面、烫金字、为纪念蒋70岁生日而出版的，汇集了蒋的一千多篇文稿），知道蒋还有这么多文稿，原来总以为蒋介石是一个“草包”、“流氓”，充其量是一个“武夫”。由于“左”的一套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能例外，即使如此，取名为《蒋介石传》也不行，有树碑立传之疑，后来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当然要写的范围也扩大了。1962年我由北京回到杭州大学执教，开设了有关研究蒋介石历史的课程，“文革”中遭殃了，几十张大字报攻击我是“美化蒋介石”，好在我的家庭出身很好，祖父和父亲均为工人，称我是“血统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过了这一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正式开设了《蒋介石

研究》这门课，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七十多万字的讲稿，提出了几十个同党史、革命史传统课中不同看法的问题，在学生中卖座率较高。想不到在“清污”中又被扫了一翅膀，问题还在“美化”的事，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很快又作了结论，基本上平安无事。但是，1983年厦门召开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年会上，我的一番有关蒋介石的发言，无法写入简报。后来形势进一步好转，我一面在南京、上海、西安、兰州、福州、桂林、杭州、奉化等地高校或讲习班上作了系统的或专题的有关蒋介石历史的讲座，一面将讲稿改成《蒋介石传》一书，记得，在这个时期民国史研究日益热闹起来了，对民国人物的研究（包括对蒋介石）也日益热闹起来了，虽然不少人说我对蒋介石的研究起步早、时间长、受难多，扪心自问，我用的精力还是相当不够的，因为1984年以后至今，我参与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就在80年代，出版界出版了不少有关民国史的书刊，就蒋介石传来讲，就有好几本，我自信我的这本《蒋介石传》（1989年出版，已重印七次，发行近二十五万册）是一本长期从事于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写的历史书。该书

已在海外发行，陈立夫先生还写了一封信给我，认为大陆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十分不易”，作者能这样写，“可敬可佩”，据说在台湾阳明山书屋（为纪念蒋介石的）还提及这本书。这一切如我在书中《致读者》一文中说的：“现在团结出版社要出这本书我是从心底里表示感激的。二十多年的心血，总算没有付之东流，许多同志为我打气，为我提供资料，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那颗火热的心，哪有这本书呢！”

为什么要讲这个“回顾”，而且以我自己为例呢？因为今天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客观环境得来不易，以我自己为例说起来可能亲切一点。我们要爱护这个环境，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今天的学术环境，没有史学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没有今天的学术环境。之所以要提倡爱护这个环境，因为有人不爱护这个环境，他们认为现在这样评述蒋介石还不够，意思是指肯定的还不够，象台湾的朋友说我写的这本《蒋介石传》有些地方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对的，我回答说我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写的。立场不一样，当然写的不一样。应该说，共产党的立场、

马列主义的立场是最科学的、最客观的，这是包含着时代的特点。上面提及的这些人的看法，会砸锅的，会破坏这个环境的。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论及。

二、蒋介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怎么评价蒋介石。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人读了许多民国史的书刊，产生了一些错觉，好象要对蒋介石“平反”、蒋介石“还不错”，再下去就更离谱了，似乎我们革他的命“革错了”。历史的结论是：蒋介石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人物，末了为历史前进的潮流所冲垮。我在《蒋介石传》中写了一篇《末了的一点论述——怎么评价蒋介石？》，把蒋在1949年前的活动（以政治生涯为主）作了分阶段的评叙，还引了恩格斯评拿破仑的一段话：“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那个被战争弄的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一点可由如下一点来证明，即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特、克伦威尔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0页)。蒋介石正是当时中国需要有的这样一个人，而且没有蒋介石就会有一个类似蒋介石的人物登上中国这个历史舞台。蒋介石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却是必然的，因为从总体上讲，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1949年以后蒋介石在台湾的活动，严格的讲，我们(主要是我自己)还没有展开也没有条件展开研究，这是近几年同台湾(包括在美国研究大陆和台湾问题)学者接触过的结论。原先我们是把台湾作为人间的地狱，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及其政权是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大陆改革开放后，外部(包括台湾)的世界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怎么来叙述蒋介石以及蒋经国在台湾的活动，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们决不能用1949年前的活动来否定1949年后的所有活动并盖棺定论，也不能用1949年后在台湾的活动来推翻1949年前的结论。1989年我在美国蒙太那大学的远东问题研究中心作了题为《蒋介石与中国革命》(题目是该研究中心出的)的演讲，我说的主题是：蒋介石参加革过清王朝的命(辛亥革命)、革过北洋军阀的命(大革命或北伐战争)，后来我们又革了他的命。我的思

路是不能用前面的革命掩盖后面的反革命，也不能用后面的反革命来否定前面的革命。但一个总的结论是1949年前的蒋介石是一个否定的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革了他的命，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研究蒋介石的着眼点。研究蒋介石及民国史上的其它人物，乃至研究民国史，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拨乱反正”，更不是“平反”，而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科学性和党性紧密地结合，论从史出，对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环节——民国史(包括民国人物)以加强研究，以史为鉴，给今天以启迪。象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早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建立过一定的业绩，后来由于他站在少数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上，背弃了人民，背弃了事业，也背弃了自己说的话(象黄埔训练时的一系列革命言语)，没有把中华民族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相反地却加深了这种苦难所以人民才起来革了他的命。

民国史上最热闹(也可以说是最轰轰烈烈)的时期是1927年4月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时期(辛亥革命的意义

当然非凡，它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国民党干的轰轰烈烈的是蒋介石统治的时候、干得反动透顶的时候也是蒋介石统治的时候。蒋介石是民国史上牵动左右的人物，把他研究清楚了，民国史上许多人和事才会研究清楚。那种把冯玉祥、李宗仁作为军事家，而把蒋介石排除在外，这似乎不符合历史事实。冯、李均为蒋的手下败将，冯、李几次反蒋均以失败告终（他们反蒋也都是为了自己）。论出身来讲，冯、李均为旧军阀，而蒋却是辛亥革命的将领。脱离开蒋介石，怎么能把冯玉祥、李宗仁的历史说清楚呢？所以我想，蒋介石研究的另一个着眼点，是以此来带动民国史的研究。

还有一点，蒋介石研究应该把主要功夫放在把蒋介石的言论比较完整地读一读。台湾出版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一千五百万字），还是比较客观地把蒋的言论（1912年至1975年的论著、演讲、文电、书信等）反映出来了，不论是研究蒋的政治或军事思想，都应该有必要读一读这套总集。读了总集可以把许多不清楚的问题搞清楚，把许多道听途说的事、误传的事、想当然的事订正过来。我们不敢说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

二十二年的历史，它的灵魂，它的基本线索，只有读总集才能掌握，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总集是蒋介石研究的一部必读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活动为例，读了总集才知道蒋介石有大量的电令外，还有四百多次讲话，还专门召开过四次南岳会议(1938、1939、1941、1944年)、柳州会议(1940年)、参谋长会议(1940年)、西安会议(1942年)、恩施会议(1943年)、黄山会议(1944年)等一系列重要军事会议。这部总集把蒋介石的东征训练、黄埔训练、庐山训练、南京训练的讲话都汇集进去了，反映蒋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当然还有大量的电令没有汇集进去，如《自反录》的许多文字就没有汇集进去。

第三个问题，要防止一种倾向。蒋介石研究可以出多种多本书刊，现在写蒋传的也只有寥寥几本，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还大有施展的余地。这里所讲的倾向，当然是指不良的。一是看这类书“卖座率”比较高，就硬往这里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革命先辈的历史研究，总是占主导和主要位置，那种认为党史研究差不多了，革命先辈的历史研究也差不多了，

这显然是一种错觉。打碎过去的有色眼镜，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破把党性放在科学性之上，那么上面讲的主导、主要位置的历史研究还有大量的课题要展开，象徐帅(向前)对西路军的回忆，使人读后，感慨万分，回想我们过去讲授的、编写的历史，很有必要从新来过。由于“往这里挤”，就出现抢先、猎奇，或堆积资料，或空洞议论，或道听途说，或虎头(大背景)蛇尾(本题)，既不象历史，也不象文学，误人子弟。二是把握不住科学性与党性的关系。科学性与党性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过去，曾经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于是出现过伪造历史，丢掉了科学性。很显然，这是不牢固的，就象建立在单薄而狭隘的地基上的大厦，很容易倾覆，一旦倾覆就会招致无穷的苦恼。但是，我们的科学性不能离开党性。历史研究这东西，历史本来的面目可以接近它，却休想复原它，能做到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就不错了。蒋介石研究不能离开我们的时代，若离开了时代，就等于真理往前走过头了一步会变成谬误。

三是越搞越细。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在大陆所占据的历史时间不长(主要活动只有二十年)，也谈不上有什

么专门的思想，尤其是劣绩胜过业绩，他的实践在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成效甚微。因此，对蒋介石的研究，宜粗不宜细，而且细也不能弄到不上品的方面去，如有人要我写写蒋的私生活，他们准备登刊，我想这个必要性不太大。蒋介石这个人物，核心活动是军事，辛亥革命、反袁、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反共、抗日，他的一生打了几十年的仗，有正义的、非正义的，有革命的、非革命的。大概为了反映蒋的私生活，书摊上出售一本陈洁如的回忆录，有几个版本，读后使人感到不真实，相反再去读一读《民国档案》(1993年第一期)上陈洁如的函件就十分可信，作为史料又十分宝贵。

三、结束语

最后，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历史学家自己只管写出信史，求出真相，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何时用，那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决策者的事，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自己决定，而且这也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我想这是符合梁启超的思想，把“学”与“术”分开。